

DIGUO DE
QIMENG



帝国的 启蒙

明朝的历史裂变
阮景东 著



线装书局

被人痛骂的皇帝，表里不一的大臣，
富可敌国的商贾，舍生取义的凡夫俗子！

**视角独特、观点震撼，
揭开一个被历史扭曲的大明盛世。**

找寻华夏原生生态文明，
重现中华文明崛起与复兴的真实路线。

作者简介

阮景东，男，河南新县人，1979年9月生，武汉大学金融学硕士，已出版作品《万历朝鲜战争》《血腥的皇权》。擅长大历史的写作手法，主张以大历史的视角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历史。



· 鼎力推荐 ·



人天书苑
REN TIAN SHU YUAN

特约编辑：杨晓晖
策划人：周耿茜 廉 宇
封面设计：顽瞳书衣
TEL: 13810594934
责任编辑：李 琳 宁 静

帝国的 启蒙

明朝的历史裂变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原来中国并不输在起跑线上，启蒙运动、内阁与君主立宪雏形、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一样不落！

明朝是一个自由、宽容、奔放的王朝。这里有成熟、体制完备的内阁，无助的君主，打滚、癫狂的思想家，个性张扬的士大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小人物。士农工商，凡夫俗子莫不在这个朝代遇到最好的伙伴和最好的对手，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在朝在野的文人，统统在这个时代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个将儒家文明推向极致的王朝，一个严格遵循儒家行为规范的王朝，一个商业文明极度发展的王朝，一个产业时代来临的王朝，一个各项指标在农耕时代达到临界点的王朝，为何会在1644年轰然倒塌？历史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大陆学者首次从大历史视角讲述明朝向近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文化的辉煌。



上架建议：畅销历史文学

ISBN 978-7-5120-1602-6



9 787512 016026 >

定价：3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启蒙：明朝的历史裂变 / 阮景东著. —北京：线装书局，2014.12

ISBN 978-7-5120-1602-6

I. ①帝… II. ①阮…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1832号

帝国的启蒙：明朝的历史裂变

作者：阮景东

责任编辑：李琳 宁静

装帧设计：玩瞳书衣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

字数：215千字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定价：35.00元

前 言

启蒙这个词汇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时髦的用语，简单地说，启蒙就是从过去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比如，在欧洲，长达 1500 年的中世纪，人们信奉的就是神学，天主教主宰一切，任何敢反对的人，就是异端。到了 18 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进，人们崇尚科学，揭露了神学的种种骗人伎俩，由此展开一场启蒙运动。

而在中国的明朝，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任何反对儒家思想的主张也是异端。存天理、灭人欲成了官方的指导思想。但从 16 世纪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王艮、何心隐、李贽等思想家率先扛起了反儒的大旗。他们认为穿衣吃饭就是天理，天理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们更加关注人本身的需求，主张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反对儒家思想对人性的压制。晚明思想家黄宗羲更是提出“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而是万民之天下”，“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民主观点。

除了思想方面，在制度方面，明代具备君主立宪的雏形。文官制度和儒家礼法对君主的约束达到极致。国家大事由内阁拟票，报司礼监批红，六科签发。皇帝跟他的军队脱离了关系，军队由兵部调配，文官统领。皇帝终身被限制在宫中，不准随意出宫，每次皇帝出宫都要跟文官集团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皇帝被迫严格地遵循儒家礼法，早朝、郊祀、庙祀、经筵都要有条不紊地进行，稍有疏忽，就会换来文官肆无忌惮的詈骂。皇位继承规则严格按嫡长子制进行，皇帝无任何改变权力。内阁大臣由吏部会推，财政开支由户部提出预算方案，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在这里，皇帝没有任何干预的权力。

它还具备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当海外市场持续扩大，传统手工生产无法满足需要的时候，明王朝便产生了很多技术革新的设备。人口向城市集中，商品经济在发展，财富在积累，这些都促使以雇佣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进而诞生了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团体，并在此基础上发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东林和复社等具备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它们以上层缙绅为主，具备普遍结社的性质，他们操纵舆论，干预朝政，反对增税，主张君臣共治。苏州的两次市民暴动，标志着这种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到了顶峰。除此之外，在那场苏州民变中，无产阶级随着资产阶级之后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引发了明代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它终于使明王朝达到了农耕文明的临界点。

所有，所有，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伟大、繁荣、昌盛的时代。

目 录

第一篇 明代的启蒙运动

1. 理性而思辨的理学
2. 伟大的心学
3. 启蒙思想家王艮
4. 异端思想家李贽
5. 明朝的基督教
6. 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推动
7. 茶陵诗派与后吴中诗派
8. 繁荣的小说市场与明代的文艺复兴运动
9. 性灵之风与明代的智者学派
10. 成化新风
11. 明朝的“达尔文”与明代的市场经济学家
12. 明代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
13. 明末民主思想家

第二篇 大明王朝的非君主义

1. 成化皇帝的垂拱而治
2. 儒家礼法压抑下的弘治皇帝
3. 被禁止出宫的正德皇帝
4. 儒家体制下绝望而荒诞的君主
5. 无助君王统治下的大礼议之争
6.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
7. 无奈的官僚严嵩
8. 可怜的皇帝万历
9. 皇权衰弱下的国本之争
10. 明宫三案中被当猴耍的皇帝
11. 南渡三案中被诬陷的皇帝
12. 那些骂皇帝的大臣们
13. 充满理想的太监

第三篇 商品经济发展所引发的历史裂变

1. 东林党
2. 矿税斗争
3. 明朝的工人运动
4. 开读之变
5. 应社与复社
6. 明朝灭亡的原因

参考资料

第一篇 明代的启蒙运动

1.理性而思辨的理学

历史上总有那么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朱棣进入南京后对儒生大开杀戒，随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大明王朝最大的卫道士。历史上也总有那么些玄而又玄的事情，虽然不为任何人所懂，但它一直能占据统治地位。这一节我们就来介绍在整个明王朝占据官方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学。

儒家思想不似道家思想那么独善其身，也不似法家思想那般冷峻无情，千百年来中国的儒生们挖空心思的重塑儒学体系，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体系。到了明代，理学仍旧是官方指导思想，这一举措在永乐时代被大大强化了，官方对于儒家经典严格地按照朱熹的注释进行解释。

朱熹对于儒家经典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了重新解读，无论他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抑或是断句和自身学识上的局限，这种解读对于我们的文化典籍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可以明显的看见他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意向三纲五常、封建礼教方面引导，从此一个开放、博大、情爱、血性、舍生取义、大争的儒学思想被阉割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裹着小脚、步履蹒跚、封闭萎缩的理学思想。

或许这种理学思想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但中国思想文化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无法看见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气象，我们所见的只是狭隘、封闭、敏感、扯皮的理学思想。

在理学的倡导下，明初一些士大夫死后竟让妻妾殉葬，这股殉葬之风竟然刮到宫廷。但历史上总有那么些个有识之士，能够在沉闷的气氛中发出令人振奋的声音，这样的人明末有一个——李贽，明初也有一个——朱季友。

朱季友是江西饶州府人，一位儒士。朱棣要修书，需要天下的士子们将藏书或者个人著作交出来，这位叫朱季友的亲自赶到南京将所著之书交了上去。朱棣看后勃然大怒，原来朱季友所著之书对理学提出异议，这的确是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非常大的事。在那个程朱理学统领一切的时代，在那个所有读书人都要按照朱熹的解释来对儒学进行朗读的时代，在那个科举考试不能超出《四书》范围的时代，朱季友的言论无异于异端学说，无异于在思想文化沉闷的大明王朝炸响一声惊雷。

朱季友究竟写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他所著的书皆被焚毁，本人也被杖责。通过这件事情朱棣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所有人的行为方式、伦理道德都必须在理学的指引下，这个事件也使得理学正式成为显学，跟理学所对立的学说成了隐学，只能在地下发展。

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著的书竟以《焚书》、《潜书》来标榜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时代，甚至这个王朝很多东西都离真理很远。

但无论如何理学的出现是中国思想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解决了儒家思想关于世界本体论的问题，使得儒家思想更加完善，续接了儒家的道统。它注重道德，讲究仁、义、礼、智、信，这些都体现了理性的原则，它注重对世界本源性的解释，这又体现了一种思辨性。

2.伟大的心学

成化王朝是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结束了朱元璋一百年来禁锢帝国的政策，帝国又前朝有过的一些自由、奔放，商业开始复苏、城市开始繁华、思想文

化开始活跃、士绅的生活开始奢靡，在这个社会整体松动下，起到稳定、凝聚作用的理学思想也开始摇摇欲坠，它必将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代替。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应该是出身于一个中等士绅家庭，祖父、父亲皆是读书人，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便已去世，23岁的母亲终身守节将其带大。陈献章自幼聪颖，19岁中秀才，但由于作品“离经叛道”，故而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既然仕途不顺，那就走学问这条道路。

当时南方最有名望的大儒是吴与弼。吴与弼在理学上有些成就，开创了“崇仁学派”，吴与弼的学说强调身心的体验，无论是吴与弼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集体滑向陆九渊提倡的心学思想，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陈献章对吴与弼仰慕已久，他跋山涉水来到吴与弼居住的江西省崇仁县，在那里两人确立了师徒关系，跟陈献章在一起学习的有很多人，都是南方数省的儒生。虽然吴与弼与陈献章都是心学的流派，但陈献章的思想更加奔放，所以跟吴与弼有些格格不入，两人的师生缘分只持续了不长一段时间便草草收场。

陈献章回到家乡新会县白沙村，在小庐山脚下特地建了一间书舍，从此潜下心来读书。陈献章读书的环境非常好，背靠小庐山，前面就是白沙河，如此春去秋来、寒暑易节，竟然过了十个春秋。

陈献章闭关既出，俨然已成一家，他随即宣布将在白沙村开馆讲学，消息传出整个广东轰动，各处学子纷沓而至，把个小小的白沙挤得是水泄不通。一来陈献章有吴与弼的弟子之名，二来岭南之地大儒本就少，三来陈献章闭关十年，人人皆知，一朝出关，必是学有所成，悟有所得。

陈献章虽然被划定为思想家，但他有所成就的还是他的教育家身份以及教学方法。陈献章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曰静、二曰疑、三曰独。“静”是指读书之前先静坐，让身心平静下来；“疑”是在读书过程中要存疑，要有怀疑权威的精神；“独”是指在读书过程中要坚持独立思考的方法，这样才能够获得真知。陈献章的这三种读书方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迷信经典，敢于破除前人的权威，从而获得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对世界观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这三点看出，陈献章所提倡的做学问方法明显带有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的特点，从而具备了心学理论的雏形。虽是如此，但吴与弼、陈献章的理论远没有达到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高度，吴、陈思想充其量只是对心学的一次初探，但也是在学术界沉闷的大明朝响起一记惊雷。陈献章和他所创立的“江门学派”不仅轰动了广东，更是轰动了帝国，远在京城的朱见深和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们也听说了他的名头，在这一刻，命运之神似乎在向他招手。

成化二年（1466年），陈献章经祭酒刑让推荐，于朝堂上当场考试，陈献章现场和《此日不再得》一诗，他泼墨挥毫、一蹴而就，众人皆惊，以为真儒复出。接下来，陈献章被推荐入吏部当一司吏，虽说入了吏部，但陈献章担任的只是一个抄写文书的低级小吏，虽然名声赫赫，但其学说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遭到保守儒生的排斥，四十二岁时，陈献章参加会试仍没能中，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仍旧进行他的学问研究。

数年后，陈献章受宪宗皇帝诏见再次入京，但京城依然没有他的舞台，他依然不为同僚们接纳，陈献章写下一份《乞修养疏》给皇帝，要求回家奉养老母，事到如今，皇帝只好给予陈献章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允其回乡侍奉老母，按月领取禄米。

无论陈献章如何知名，也无论他如何努力，再无论上至帝王下至各级官员如何支持他，他还是不容于大明官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历史到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观，学术界的思想开始松动，但我们的明王朝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一切所需要的仍是时间。帝国虽然失去了一名进士，但得到了一名思想家，这对于帝国来说却是福分。

虽然陈献章一直未能真正踏入官场，但他所教的成百上千的学生中有很多日后跻身官场，

并成为大明帝国的中枢人才，而这些学生无疑有力地传播了他的思想与读书方法。

后吴中诗派的诗作风格只是从一个细枝微叶的地方反映出明代中期士风的变化，除此之外，心学的风靡乃至发展到与理学分庭抗礼的地位才真正反映出思想领域解放的开始。

我们这个庞大而悠久的国家难以用技术治理，只能依靠一种行为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稳定，此种治理方法最简单、省事，就好比建房子的时候你做好一个模子，然后直接往里面灌水泥。这种规则就是儒家所规定的伦理道德，当一个人守孝道的时候，他自然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一个简单的“孝”字就能令我们这个国家井井有条，当一切都规则化的时候，每个人只需按部就班的生活。几千年的华夏就是在这种传承中度过的。

虽然儒家思想被奉为华夏最有效的治国思想，但是其对本源解释的缺失使得儒学 1000 年来始终存在缺憾。虽然后来的儒家思想将一切本源解释成“理”，“天理”成了人们的指导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天理”跟人的欲望是相对的，要想遵循天理，只有灭掉人欲。状元舒芬就在给朱厚照的上书中指出皇帝的出游是人欲的表现，为了保存天理，必须废除巡视，老老实实待在宫中。

天理是什么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即使是它的创始人也解释不清楚，既然说不清楚，那么儒学关于本源问题的这个任务还是没能完成，正因为解释出现了纰漏，也才给其他哲学思想的发展留下空间。

南宋淳熙二年（1175 年），江西省铅山县这个地方热闹异常，誉满天下的两名大儒会聚在铅山县的鹅湖寺举行千年大辩论。一方是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另一方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朱熹认为对于真理是通过“格物”而得来的，穷尽事物之理，多读书、多思考，才能获得真理。而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宇宙既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所谓的格物就是认知本心，只要搞清楚了自己的内在，真理自然就明白了。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论了三天，最后是不欢而散。

虽是如此，心学在南宋并无大的影响力，它一直未能取得跟理学分庭抗礼的地位，这些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到了明代，商业的兴起、思想的活跃、理学的桎梏，这些都使得心学开始成熟，完善起来。

跟明代的其他心学大师一样，王阳明也是一位不循规蹈矩的人，在他小的时候就流露出对读书取仕不感兴趣的态度，长大后王阳明并非像一般的读书人那样埋首屋中，而是喜欢游历，并对兵法感兴趣，他曾经游历塞外，查看边防。

王阳明曾在父亲的官署中对着竹子格物，王阳明连续“格”了几天几夜，最终不但没格出“理”来，反而病倒了。从此王阳明对程朱的理学产生了怀疑，此后他的内心便宽泛起来。我们这位阳明先生开始对道学、禅学感起兴趣来，他对天地的疑惑更试图从内心寻找答案。

正德元年（1506 年），王阳明被牵扯到“逆党案”中，刘瑾拟定的逆党名单中，兵部主事王阳明赫然其中，王阳明跟其他官员一样受了廷杖之刑，后被贬到贵州龙场任驿丞。

大西南这片远离喧嚣的土壤给王阳明的悟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他开始思索本源性的东西，力图解开自己少年时代就存在于心中的疑惑。类似于王阳明这样有思索精神的儒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不像大多数文人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权威著作，并不厌其烦地将这种理论进行复制。

在贵州，王阳明开始收弟子，从这一刻起，在帝国这个静悄悄的角落开始进行思想领域的一场变革，一天夜里，阳明先生突然睁开久闭的双眼，他顿悟了，他明白了不必再纠结于理学的是是非非，真理就在于自己的心中。

学生们对于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见解不理解，他们疑惑道：“南山里的花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

阳明解释道：“你不去看花时，花便不存在，你去看花时，花便在你的心中。”

与理学一样，心学也同样陷入一种桎梏当中去了，过于注重细枝末节的东西，实际上处

于一种诡辩的泥潭中，理学与心学的转换，只是中国的儒学思想从一个桎梏进入另一个桎梏而已。事间万事万物皆有规律，竹子的规律就在于它是竹子，它只是自然的生长，自然的枯萎，对于花来说，无论花凋谢与否，它都存在于世间，于人的内心无关。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竹子在春天的时候青色、挺拔，到了秋天就会脆弱、枯黄，这就是它的生长规律，万事万物都改变不了它的生长规律；花的开谢也是如此，这个月花儿盛开，下个月就会凋谢，即使你不去看它，它也是这样，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是客观事实的存在。

程朱理学认为格物而知理，人们需要通过对外界的持续认识来获得真理，而这种认识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心，所以对于真理的掌握不能够将内心完全抛开，理学在论道过程中将外界与内心完全割裂开这是偏颇的。

阳明子的心学论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心外无理、格物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无理”是指道理存在于内心之中，撇开内心则对真理无处寻找；“格物致良知”中的格物是指格内心，而不是格外界，通过内心的反省能够获得优良的品质。阳明子在《传习录》中指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王阳明所说的格物主要是指求善去恶；通过格物的方法，然后再通过格物所应坚持的原则最终达到的目的乃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反对将“知”和“行”割裂开来，他认为“知”和“行”是统一的，“知”是为了“行”，而“行”反馈回来更好地让人们获取“知”。但王阳明认为先知后行却是有失偏颇，实际上，我们的认知都是通过实践而来，没经历实践，我们的认识也是残缺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们的认识都是来源于实践，最终还是要返回到实践中去，这才是完整的知行观念。

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王阳明都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在于天理，意识决定物质，不同的是程朱认为对于天理应该通过探究外部世界而获得，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陆、王认为对于天理的获得应该通过内心，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至于什么是天理，通俗地讲它指的就是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在认识规律上都是偏颇的，他们将实践与内心完全隔离开来，采取了完全对立的二分法。书本上的知识，圣人的学问都是来源于实践，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也必须通过实践，但实践又必须反省自身，通过自身的思考来加强我们对实践的理解，两者是统一的关系，反复的实践，反复的思考才能使我们对规律的认识更加强化。

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了争夺学术正统地位而进行的一种争斗，学术派别之间的那种隔阂阻隔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阻隔了他们理论、观点的融通，更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以致于中国的儒学思想一直是原地打滚，跟公羊春秋学比起来甚至是严重的倒退。

无论如何，心学在明代的壮大是思想领域界的一场大事，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心学的祖师爷正是孟子，他曾提出过“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心学顺应了明代中期以后人们思想独立、个性张扬的潮流，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理学面对君主不同，心学更多的是面向市民阶层，更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发展，它推动了明代末年更伟大思想家的诞生，它也推动了明代后期市民运动、东林清议、党社运动的产生，在这里，天理与人欲不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万历朝的那种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与心学发展也不无关系。但当明朝灭亡的时候，当知识分子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所信奉的思想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无力，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儒家的桎梏对于国家的深深危害，那种清谈的毫无意义性，也就是在这一刻，他们彻底解放了，彻底冲破了儒家的桎梏，也还是在这一刻，中国的哲学思想转向了“经世致用”。

3.启蒙思想家王艮

虽然在王阳明之前便有学者提出通过内心自省的方法获得世间真理，但这只是对“理”的不同格物方法而已，而王阳明首次提出心学概念，第一次将心学理论化、系统化，这无疑带来心学的风靡，他的弟子越来越多，遍布朝野，而这众多的弟子也使得心学开始分化，虽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心学分为十七学案，但我们进行一下归纳的话，实际上为两派。

一为左派，二为右派，右派继承了王学的原教旨主义，而左派却在王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开始反对一切正统，一切权威，到了后期甚至打倒一切儒家经典，它已经背离了王阳明的心学道路，甚至进入离经叛道的行列。在这里要特别指明的是，心学左派严格地说与心学并无关系，因为它最终进入到反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境地，但是为了讲述的系统性，我们暂且按照《明儒学案》的分类来进行。

王学右派以聂豹、徐阶、赵贞吉为代表，后期的东林党也属于右派行列，而王学左派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心学推广的短短时间内，心学这门新兴的哲学思想就已经出现了分化，王门右派被官府吸纳成为帝国的正统思想，而心学左派则成为理学与心学右派共同打击的对象。鉴于此，本书对于心学的论述则从它的正统转向左派，因为左派相对于右派会产生更多的精彩篇章，而对于何心隐、李贽等人本书后面还会以很大篇幅来论述，在这里先讲讲王艮和他的泰州学派。

王艮是江苏泰州人，世代以煮盐为生。虽然对于心学来讲，王阳明是集大成者，但真正将它推向民间，推向底层，成为大众津津乐道话题的还是这位王艮。

王艮家贫辍学，全靠自学，所以他身上少了那些经院派的习气。对于不懂的东西，他不耻下问，在读书过程中他不拘泥于朱熹的注解，而更强调自己的理解。王艮对儒家经典也是批判地继承，他在给学生的讲课中也全是自己的主观论断，而不是对经典著作的翻译。

王艮做讲义颇有宗师风范，前来听讲的人问道：“为何汝的观点与王守仁很类似啊？”王艮是知道王阳明的，他的主张在某些方面也的确跟王阳明类似，他非常敬佩这位大儒，他觉得是时候向这位大儒请教了。

不久后，南昌城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奇装异服，行为疯癫。王艮与王阳明不同，王艮行为乖张，好标新立异，以至于王艮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特立独行的时候显得有些矫情和做作。

王阳明对于王艮的举动并不感兴趣，虽然王艮下定决心要拜在王阳明的门下，但王艮的学术思想与王阳明差异还是很大，我们很难说王艮是否有拜在王阳明门下的必要，也很难说王艮在王阳明这里获得了什么。

王艮赞同王阳明心外无理的主张，他也认为天理只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但在一些方面，王艮与王阳明仍旧有着很大差别。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

“即事是学，即事是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即道。”

这两段话是王艮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有别于王阳明的地方。前一句是指天理就存在于人们心中，不用去穷、不用去格，它自然就会出来；后一段话是指世间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天理，天理就存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之外去寻找天理。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是不赞同的，天理即使只存在于人们心中，还是要靠我们去格、去穷尽，否则今天你占了点小便宜，不去反省，明天你就会得出占小便宜是正确的论调；对于第二种观点我是赞同的，万事万物都存有天理，柴米油盐、邻里争吵，都存在有天理。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两种看法都是王阳明反对的，王阳明主张人的内心经过不断的格物从而获得良知，岂是王艮所说那般简单；对于第二点，王阳明更是不能容忍。王艮认为日常生活中都是“理”，再加上这种“理”很好理解，所以将王艮的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指心学这种东西对于凡夫俗子也可以掌握，并不是圣人所独享的东西。

王艮的这种观点无疑是爆炸性的。虽然两千年以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但也并不是意味凡夫俗子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坐而论道。王艮无疑要将这种圣人之道推向所有的人，这是儒家等级秩序所不能容忍的。社会每个阶层的分工不同，有的人注定要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更多的人只有从事体力劳动。

王艮出身本来贫苦，煮过盐，小时候上过私塾，后因家贫而辍学。19岁那年他跟父亲一起贩盐来到山东孔庙，当他拜谒孔庙的时候他感慨地说道：“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王艮在毫无知识学问的时候，他便有了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想法。从此他便将儒家经典写在纸片上藏于袖中，在工作之余拿出来翻看，王艮渐渐地从煮盐转变为贩盐，他也渐渐的成了富户，这给他从事脑力劳动提供了条件。

王艮是社会底层的人，他行过医、贩过盐，最终找准了做学问这条道路。王艮是从社会最底层奋斗起来的，没有父兄提供资助，没有有名望的先生提供教育，他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从书本中寻找知识。正是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使得他对底层社会有了了解，他对底层人民有了了解，这也坚定了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圣贤的真理。

王艮觉得他跟王阳明之间再无可谈，于是在嘉靖二年（1523年）模仿孔子周游列国，王艮自制了一辆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打着传播圣学、拯民愚昧的招牌开始向京城行去。王艮一路上奇装异服、大声吆喝，史载“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魅目之。”

王艮每到一处便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王艮面对的全是凡夫俗子，田间农夫、走街履贩、卖盐打渔的都成了王艮说教的对象，王艮的此次北行无疑引起了轰动，并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而王艮的此次说教是对中华两千年来的等级秩序、伦理秩序的首次冲击，具有异端的色彩。

在他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万物都是一体的。王艮从注重内心开始转向注重自身，“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在王艮这里，心学似乎已经向着“安身立命”的“身学”转变，而这种“身学”更是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相比心学多了一份实在性，少了一份玄幻。王艮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民本思想，而此种民本思想跟孟子的民本思想仍是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以民为本”是在强调等级秩序的基础上行仁政，而王艮的民本思想却是带着启蒙思想的意味，他也成了中国启蒙思想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中国的思想届似乎一下子飞跃地向前推进，而此时的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之中，他们出现启蒙思想家卢梭仍然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

王艮所引起的轰动与议论很快传到王阳明的耳朵里，他大发雷霆，命人赶快把王艮唤回来。王艮回来后，王阳明三日不见，王艮长跪不起。每个人心中都有开放与保守一面，对于别人的开放与保守同样都是嗤之以鼻，王阳明对朱子学说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陈旧的东西，对于王艮学说他同样是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异端。

无论王阳明恼怒与否，王艮已经超越王阳明成为帝国的新星，很多地方的大员将王艮邀请到当地书院讲学，而一旦开讲，各地凡夫俗子纷踏而至。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逝世后，王艮开始自立门户，由于他是江苏泰州人，后人便将他这一门派命名为泰州学派，虽是如此，但它仍被认定为王学左派，它跟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有无关系，我们已经很难评价，既然黄宗羲在他的《明儒学案》中将泰州学派列为王学分支，那么我们也这么认为。

泰州学派共传五世，共计487人，其中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农夫、有工匠、有商人，士农工商样样皆有，很多人因此载入史册，或入祀典，或入贤祠，光是《明儒学案》记载的就达三十几人。在王艮的影响下，底层民众终于有了读书取道的机会，他们的

名字也能跟那些大贤一样堂而皇之地彪炳史册。跟王艮一样，他的大部分弟子也是终身不入仕途，以讲学为己任。

王阳明曾经奉命镇压南方农民起义，杀掠甚重，后来为了劝导人们从善，王阳明提出了“格物致良知”的观点，但这种脱离底层群众的“致”法却难以带来实际效果，其结果只能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自成一套理论体系。

王艮反对君子之道，提倡百姓之道，人人皆可为圣贤，人人皆可为君子。他更是提出了“安身立命”之道，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王艮的安身立命充满了人本思想、关怀思想，他指出每个人吃饱、穿暖、有房住，是为安身，只有安身后才能谈及安家、安国、安天下，这跟圣人所说的修身截然相反。一个“修”字，一个“安”字就蕴含着不同的意味，“修”字强调人的义务，而“安”字强调人的权力。无独有偶，700年前的诗人杜甫就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而安身也成了一个人获取良知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人连安身条件都不具备，他是无论如何也格不出良知的。所以泰州学派才具备真正的民本思想。

王艮的学说不仅具备民本思想，更是对封建礼教、封建等级秩序的冲击，但在那种封建礼教森严的文化传统下，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王艮的学说无疑是一种虚幻，不可能实现。王艮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更加无以复加的地步，并最终跟整个封建势力对立起来，他的弟子们也为此献出了自己不屈的生命。

在王艮之后，我们可以从他的弟子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看到更多的精彩人生，但王艮作为启蒙思想的创始人，他无疑是整个明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自身文采不高，王艮鲜有著作留传于世，他的弟子将他的讲义整理成了《王心斋先生遗集》。

4. 异端思想家李贽

王阳明心学主张天理通过内心的省悟来获得，王艮学说主张天理就在日常生活中，无需去省悟，芸芸众生也能够体验到天理的存在，由于王艮学说宣扬天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就具备了启蒙思想，这跟孟子的“以民为本”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以民为本”只是让君王爱惜百姓，并没有认为百姓能够获得认知的权力。

我们至今无法对王艮学说取一个专有名词，由于它打碎了儒家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认为它跟儒家思想没有任何联系，在那个等级秩序仍旧森严壁垒的封建社会，这种学说只能以“隐学”来定义。

王艮的门徒不少，但李贽的出现使得这一门学派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对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无论历史学家如何赞誉，李贽都是泰州学派的传承者，他的学说跟王艮学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李贽过于高调，加之跟官场、士大夫有着过分亲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影响力无疑被放大了。

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1527年出生，25岁中了举人，李贽对做官兴趣并不大，或许他认为自己并不能考中进士，他便不再坚持继续科考。29岁那年，李贽被任命为河南共城教谕，按照李贽的说法，此时他已经家道中落，还有妻儿要养活，若非如此，他断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李贽的理想在于著书做学问，官场对于他是一种折磨，他只喜欢在自己自由的精神世界里翱翔。他在河南为官期间，就已经显露出与上司不协调的现象，工作之余，他便自闭门户钻研学问，但身在官场却身不由己，他的那种自由理想仍旧受到干扰，或许他还没有找到真理的钥匙。

四年后，李贽前往南京国子监担任博士，这是一个好差事，既能养家糊口，又能钻研学问。但好景不长，李贽的父亲病逝，他只能回乡丁忧，加上母亲早已故去，此时李贽已经失去了双亲。在家乡丁忧期间，正值倭寇进攻泉州，他率全族三十多口人登城和全城的父老乡亲一起日夜防守，终于击退了倭寇，也算是他人生中的一次辉煌。

丁忧期过后，李贽带着全家人去了北京等待分配新的官职，在京城这段日子是李贽最痛苦的回忆，连续十个月，他都未能分配官职，囊中羞涩，他只能靠在别人的私馆中授课来谋取生活。据李贽自己说，他有一次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最终李贽等来了北京国子监博士的职位。但好景不长，他的第二个儿子死掉了，接着，他的祖父又逝世了，李贽只得又回乡守制。在南下的途中，他将朋友和同僚送的丧葬费拿出一半在他曾经任职的河南共城买下一处田产，他将妻子和三个女儿安置在河南共城，让她们母女在田间劳作和靠纺织过活。李贽拿另一半费用将祖先三代五口的灵柩体面安葬。在此之前，李贽祖先三代五口的灵柩由于不能体面安葬而停放了五十年。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情，也能令李贽感到他替家族尽到了义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家乡再次守孝三年期满的李贽返回了共城。此时，夫妻之间已经有三年没有见面，见面之后，妻子告诉他，二女儿、小女儿吃草难以咽下，已经死于饥荒，李贽悲痛连连。当天夜晚，他跟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此时的李贽心中，我们不知道做何感想，此时李贽已经39岁了，但属于他的人生还远没有到来。

李贽携带家眷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被安排为礼部司务，从九品，是个比从八品国子监博士更差劲的差事，但李贽却开始安稳下来，他在北京一直待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他接触到了王守仁心学，从此，开启了他的人生之路。

从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前往南京刑部就任员外郎，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愉快的时候，在南京这个风气开放、人文荟萃的地方，李贽是如鱼得水。在这里，他结识了诸如焦竑、耿定理、王畿、罗汝芳等泰州派人物，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跟李贽所追求的众人平等的思路一拍即合，李贽终于找到了知音和终身在学术上的奋斗方向。

无论后来如何的艰苦和沮丧，这七年都是李贽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万历五年（1577年），50岁的李贽前往云南姚安任知府。临行前，他将女儿和女婿安置在湖北耿定理家，他临行前对耿定理说：“我三年任期满，便归来依靠正四品俸禄跟你一起探讨学问。”

云南地处边疆，又处于民族杂处之地，历来难以治理，李贽主张行无为之治，在这方面，他明显不知道治民的复杂性，只是一厢情愿的为之，其结果不仅取不得应有的作用，还跟地方的官吏格格不入。云南的三年，李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时，他再也无意于官场。官场对于他只能是一座囚笼，如今他已经得到了这份正四品俸禄，经济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是禁锢。

但朝廷并不允许李贽致仕，他跑到滇西大理鸡足山躲藏起来，万历八年（1580年）他彻底告别了官场，从此开始了向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礼教抗争的过程。

“万物皆生于两”，源于矛盾着的阴阳二气，而“不生于一”，并非生自“三纲五常的天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追求物质享受乃是“秉赋之自然”，“各从所好，各驰所长”。这些都是李贽抨击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观点。

这么些年，李贽的妻子黄氏一直默默陪伴在他的身边。她的付出、她的默默承受，尤其是在河南的那三年，一个女人拖着三个孩子依靠几亩薄田度日，在灾荒来临的季节，只得依靠野草为生，中国女人的忍耐力在这一刻爆发出来。李贽的放弃仕途无疑是对这个女人的一种打击，但为了丈夫的那个缥缈梦想，她还是默默地接受了。

她跟随李贽回到了湖北黄安，回到黄安并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毕竟自己的女儿、女婿

在那里，对于李贽的配偶黄氏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更好，而且耿家家境殷实，供养李贽一家也是绰绰有余，除了耿家，还有周思敬的周家，他们都愿意充当李贽的居停。

李贽在耿定理家中居住期间，开始了系统的反孔过程，虽然王艮学说已经使儒家体系动摇，但王艮只是给人以引导，或者给以暗示，到了李贽这里，情况便明显不同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李贽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做学问在哪里都可以做。吴与弼、陈献章都是在自己的家乡做学问，招收门徒，但李贽为什么不这样？关于此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着精辟的论述。

黄仁宇认为，在我们这个农耕国度，民众最大的追求就是通过辛勤劳作获得余钱，通过几代的积累获取多余的土地，然后上升为地主阶层，将后代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再通过几代的拼搏，从而使家族中有人能够通过科举步入士大夫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然。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见，但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散文家归有光说过，如果他要离开家乡，就必须带着百余口的族人同行，李贽在泉州抗倭的时候，当泉州城被倭寇围起来的时候，李贽就要负责为 30 余口的族人寻找食物。

通过黄仁宇的讲解，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李贽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他无法履行他所应承担的任务，他没有脸面面对族人，抑或者他一心做学问，不愿意受到族人的干扰。虽然李贽没有给他的家族尽到全部的义务，但他无疑事实上成了这个家族最荣光的人，因为直到今天，这个家族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考证的对象。

李贽和耿定理相处的岁月只持续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李贽主要是研究道学，他写下《解老》一书，来诠释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万历十二年（1584 年）耿定理逝世，这对李贽是个打击，他似乎一下失去了交流的对象。

而李贽跟耿定理的兄长耿定向一直不和，其实受耿定理的影响，耿定向也是泰州学派的门徒，他不相信玄而又玄的天理，他也认为天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但跟王艮和李贽不同的是，耿定理显得很低调，他内心对程朱理学提出了疑问，但在日常行事乃至官场上，他还是儒家思想的那一套。

耿定向的思维与行事跟那个时代很多官僚一样，虽然理学、心学已经没落，但这个时代还需要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静。两个人说的话不适合在三个人场合下说，三个人说的话也不适合在五个人场合下说，这就说明公之于众的言论与私下里的活跃从来都不是一回事，推而广之，孔子不一定就信仰儒学，朱熹也不一定就信仰理学，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维持一种秩序的稳定，或者以最小的成本来治理这个最庞大的国家。

正因为这样，李贽说耿定向言行不一，耿定向说李贽既矫且伪。万历十二年（1584 年）八月，罢官多年的耿定向复职为都察院副都御史，这明显引起了李贽的不快。李贽在《答耿中丞》一文中说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以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

这番话李贽明显表现出了不以孔子作为是非评判的唯一标准，万历十三年（1585 年），耿定向再次升职，李贽再也无法忍受，遂离开耿家。离开前，李贽写了《答耿司寇》一文，在此文中，李贽对那些他认为的信奉儒家思想的伪道士进行了深刻批判。

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反不如市井小夫……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这是李贽的一番话。他的这段话是对着耿定向来的，他痛恨耿定向这样言行不一的人。

跟王艮、何心隐一样，李贽主张众生平等，这其中也包括男女平等。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中对此有正确的描绘，他说道：“在中国，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她们的闺房只能自己的丈夫或者未成年的男子能够进入，即使是父亲、兄长也不能进入，她们出门也是乘坐轿子，除了家里人，她们从不接触其他男子。但这只是针对大户人家的女子而言，平民家的女子则不在此列，他们跟其他男人一样，需要为生活而忙碌，她们也需要下地耕田，走织贩屨。”所以，大户人家的女子只是帝国的极小一部分，封建礼法对大多数女子来说并不适用。

针对李贽的挖讽刺骨，耿定向也进行了反击。他说李贽收受女弟子，随意进出女眷的内房，而且引诱自己的弟弟嫖娼，李贽对此丝毫不理会，在他眼里，既然男女平等，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授受不亲之说。

当耿定向二次升官后，耿、李二人之间的关系已再无回旋的余地，万历十三年（1585年），李贽带着妻子、女婿、女儿、外孙、外孙女前往麻城。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这是李贽在《剃发》中的诗句。万历十六年（1588年），因为家中的叔侄、兄弟不断来麻城逼迫自己回去，他便前往麻城的芝佛院居住，既然入了空门，身边的女眷便不能随行，李贽便打发她们回到福建。为了彻底表示自己跟儒学划清界限，同时避免家乡的族人纠缠，他还剃了发，但是没有受香疤，从这点来看，李贽也并没有入佛教，但既然如此，他也就跟天下的儒生彻底决裂了。

李贽在芝佛院一直住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一共是住了十年，这十年是李贽著书立作的迸发时期，他刊印了《焚书》与《藏书》，《焚书》的意思是这部书在将来必定会被焚毁，《藏书》的意思是这部书只能偷偷地藏起来，不能示人。《焚书》是将李贽生平和士大夫们来往的书信以及他所写杂文收集起来，《藏书》记载了自先秦开始，一直到元代约800个历史人物的传记，李贽在藏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再是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而是从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来考虑。从这个是非判断标准来说，秦始皇、武则天这些行霸道的君主都被李贽推崇，陈胜、项羽这些历史的失败者也被他单独立传，但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们却不见其踪，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在李贽眼里也是笑谈。

李贽在芝佛院的十年正是他从61岁到71岁的十年，他在芝佛院开讲，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来听讲，他是男孩女孩一起收，而且他讲课不拘俗法，他不会教授人们“修身、齐家”这些东西，他讲课完全是率性而为。别人都教育孩子走路要轻、说话莫大声，李贽偏要他们蹦蹦跳跳翻跟斗，大声吆喝震天吼；别人教书在白天，李贽让孩子们白天帮大人种地，晚间来听他讲学。李贽自己也开荒种地，体会劳动的乐趣，但他出入坐轿，又保持了士大夫的优待。

李贽在某些方面的作风的确有些荒诞，或许有些故意为之，从这点看，李贽这个人又很矫情。有一回，李贽给小孩子出了一个谜语：皇帝老子去偷牛，满朝文武做小偷；公公拉着媳妇手，孩子打破老子头。孩子们冥思苦想想不出来答案，李贽便笑道：“皇帝老子去偷牛是指君不君；满朝文武做小偷是指臣不臣；公公拉着媳妇手是指父不父；孩子打破老子头是指子不子。”孩子们听完这个谜底都很兴奋，他们四处传播，在当地带来很坏的影响。

这还仅仅是个个例，李贽在麻城居住期间跟御史梅国桢一家来往过密，梅家在当地是世家，梅国桢又正在西北掌权，梅国桢有一位孀居的女儿叫梅澹然，梅澹然拜李贽为师，李贽说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李贽还跟梅府的另外几个女眷，以及其他大户人家女眷也有来往，梅澹然在家中筑一绣佛精舍修行，李贽则经常跟这些女眷出入绣佛精舍，甚至进入女眷的卧室。李贽将她们取法号为善因、明因、自信、无明、澄然，除了颂扬梅澹然以外，李贽对这些女眷也赞誉颇多，他说：“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

李贽还专门有一首题“绣佛精舍”的诗：“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